

尤·雷特海乌创作中的楚科奇族文化书写

——以《鲸群离去》为例

程爽婷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雷特海乌是俄罗斯少数民族楚科奇族知名作家, 他的所有创作都以楚科奇民族生活为背景, 始终观照着母族的传统文化、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1977 年创作的小说《鲸群离去》围绕着民族起源的传说展开叙事, 将民族文化的缩影嵌入叙事结构之中, 其中关于族源神话、萨满文化、民族节日与仪式的书写散发着极地民族特有的文化气息。

关键词: 尤·雷特海乌; 楚科奇族; 《鲸群离去》; 文化书写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鲸群离去》是雷特海乌(1930—2008)的里程碑式作品, 其艺术与审美特征契合了俄罗斯 20 世纪 60—80 年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该时期出现了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以及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花狗崖》等自然哲理小说, 这些作品均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叙事的核心主题, 其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小说再现了世纪末对人在宇宙中位置的哲学思考, 提出了诸如“人们如何以及为什么发明了这一切?”“为什么整个世界和人民都在艰难生活?”“如何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以及“人与自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鲸群离去》的细节描写深刻体现了楚科奇民族文化基因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小说犹如一部民族文化史诗, 作家借用民族起源的图腾神话讲述沿海砾石沙滩部落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过程, 再现了楚科奇民族生活图景。鹿血管捻成的线、牛尾鱼刺磨成的针、鹿皮和海豹皮缝制的服装、海象皮顶的棚屋、鲜美的海象肉、海豹肉和髯海豹肉、鲸鱼节、鲸鱼舞等生活细节的描写无处不散发着极地民族特有的浓郁的文化气息。作家为读者呈现了楚科奇人丰富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文化, “在小说中他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给予他灵感和文化底蕴的楚科奇人民以及这片土地的热爱、歌颂和赞美。”(周江波 2020: 16)

2 楚科奇族神话意蕴

楚科奇族是俄罗斯北方少数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东北边远地区, 地处北极, 人烟稀少, 环境恶劣, 长期过着氏族的原始生活。楚科奇人与爱斯基摩人的接触推动了经济转型, 促使部分群体转向定居生活与海上狩猎。在陆地猎人大量涌入海边的压力下, 一部分爱斯基摩人被迫迁出, 一部分被同化。楚科奇人和爱斯基摩人的相互影响还体现在诸多方面: 楚科奇语中与海上狩猎相关的词汇有很大一部分源自爱斯基摩语, 而西伯利亚爱斯基摩语中

反映鹿业养殖的词汇则源自楚科奇语。爱斯基摩人的民间口头创作中有许多反映驯鹿放牧生活的童话和传说，这些故事源自楚科奇，而爱斯基摩人的神话故事情节也体现在楚科奇的神话、童话和传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楚科奇驯鹿猎人越来越多地定居在海边，与海边猎人长期接触，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捕捞技术——制作鱼叉和皮船。从那时起，在楚科奇神话中逐渐形成与各种极地海洋动物和鸟类有关的神话与传说。

楚科奇民间口头创作是楚科奇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代极地猎人和驯鹿牧民们智慧的结晶。楚科奇民间口头创作非常奇特，与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不同，具有神幻性特点。楚科奇的民间故事体裁、情节与形象尤为丰富。著名学者博戈拉兹将体裁分为“大地、太阳、月亮、人、动物创世的神话、各种神灵的故事、关于怪物克勒（кэль）的童话、萨满故事、日常生活童话故事、楚科奇人与科里亚克、尤卡吉尔人、爱斯基摩人之间冲突、动物童话、咒语和民歌。”（Батьянова, Тураев 1992: 563）楚科奇的神话观念中，人与动物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北极熊可以长着人类的面孔，像人类一样生活在雪地或是毛皮住所中。它们的形象是半熊半人，拥有人类的思维和语言。鲸鱼、海豹、海象等海洋动物是楚科奇神话的常见意象。例如一则神话故事中讲述女孩因为拒绝了婚姻而被父亲和兄弟倒吊在悬崖上，悬吊的绳索断裂，女孩掉进海里，落入海象的怀抱，她也因此成为海象国的女主人；另一个故事则是鲸鱼成为女孩的丈夫，她生下鲸鱼宝宝，并用母乳将其喂养长大。许多民族都有关于女性与某种动物联姻成为氏族始祖母和其后代的神话故事。

苏联民俗学家托卡列夫收集了许多关于氏族或部落起源的传说和信仰的例子。他发现了许多故事与古老图腾信仰之间的历史联系，这种信仰进一步巩固了传统、习俗与仪式，人必须严格尊重信仰，因为人本身就是习俗与仪式的建立者和祖先。研究俄罗斯北部土著民族神话的学者发现，长期生活在西伯利亚的民族，如“汉特人（ханты）、曼西人（манси）、谢尔库普人（селькупы）仍然相信他们起源于熊、兔子、鹅、鹤、梭子鱼或青蛙。”（Соколова 1972: 216）在后来的带有童话元素的过渡型神话中，甚至出现了生活在深海中的“鲸人族”。关于兽变人、人变兽、人与兽通婚的情节在许多因纽特人和楚科奇的神话传说中都有记载，其中特别受欢迎的是女孩与鲸鱼联姻，成为人类和海洋动物祖先的故事，在整个楚科奇以不同版本而流传。

雷特海乌的中篇小说《鲸群离去》中融入了楚科奇神话中“女性与鲸鱼联姻生育后代”的母题。小说的第一部分中作家再现了纳乌的年轻时代，展示了一个因女孩纳乌和鲸鱼雷武结合而创造的和谐的神话世界。作家借用了楚科奇民族《努那格米特的鲸鱼》（Нунагмитские киты）、《女人生养的鲸鱼》（Киты, рожденные женщиной）、《小鲸鱼》（Про китенка）等神话故事的情节。小说开始就描绘了一个由有生命物与无生命物构成的充满各种物质声音的世界：黄鼠的吱吱叫声，山岩下鸟儿喧闹的叽叽喳喳声，小溪流水的潺潺声，浪击山岩的轰隆声，风吹的沙沙声，微浪的汨汨声，黑乌鸦沉闷呀呀叫声，北极狐咕噜噜地吵叫以及鲸鱼水柱直冲云天的呼啸声，纳乌就沉浸在这个由各种声音构成的世界中，感受着周围的一切。这一部分重在讲述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不可分割性。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地球、水、天空、人。

沿海人类的起源正是源于少女纳乌，她拥有神话般的意识，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纽带，是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她是这一庞大世界——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闪光的和隐没在黑暗中的，沉睡在沉寂的高空和浮云覆盖之下的，隆隆作响的一分子。”（雷特海乌 1997: 8—9）在遇到一只名叫雷武的鲸鱼后，“伟大的爱”向她袭来，只有当纳乌设法将自己从自然世界抽离出来时，她才能感到内心中另一个特殊的世界。作家描述了好似“天外来客”的少女纳乌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展现出人的自然情感（喜悦、恐惧和爱）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人们对周围世界和自己的认知。“伟大的爱”不仅揭示了周围世界的新面貌，还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如果说“伟大的爱”赋予了纳乌智慧与快乐，将她从自然世界中抽离出来，那么“伟

大的爱”则赋予了鲸鱼雷武成为人的机会。在作家看来，爱不仅是氏族产生的原因，也是理性的起源。雷特海乌将民族起源神话进行了改写，“作者在叙述时，把原始神话、部落传说、民间歌谣镶嵌在叙事中：或者对先前神话进行演绎，使其复活，演绎中包含着强烈的现实性创作动机。这类叙事，其题材和情节的外观往往仍是神话本身。”（叶永胜 2008：40）作家强调作品的复杂性，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体裁类型——现代传说。按照这类民间传说体裁传统，作家没有解释纳乌的父母是谁，或在哪儿，谁抚养她长大，她靠什么生活，在哪儿睡觉。她从未见过其他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在雷特海乌的叙述中，事件发生的时间是非常抽象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也比较模糊，只是靠近大海的冻土带。

渔猎图腾崇拜是楚科奇族信仰之一。“在楚科奇人的神话传说中，主要角色大都是白熊、鲸鱼、海象以及乌鸦。”（孙运来 2005：108）纳乌与雷武是具有创世意义的图腾神话中的神幻人物。“神幻人物也就是图腾祖先。他们既是某种动物的（偶尔也是植物的）原初生育者或创造者，又是人类一定的氏族群体的原初生育者或创造者；这一事物群体将该动物物种视为‘亲骨肉’，即亲属、图腾。”（梅列金斯基 2009：19）在楚科奇原有的神话中，纳乌就是海岸上的第一位女性，是海岸上楚科奇人的祖先。

古亚细亚神话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动物拟人化，具有双重特征。雷武与纳乌联姻，这种婚姻关系被认为是与自然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社会交流的开始，是形成社会的一种方式。在神话中，动物变成人往往象征着生命与自然的紧密联系。这种变化不只是外表上的转变，更体现了人与动物、植物之间的平等关系——它们都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少女纳乌与鲸鱼之间“伟大的爱”正是这种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体现。通过这种原始的联结，雷特海乌提出了他的哲学思考：善良、记忆和良心等人类特质，其实都根植于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之中。整个故事的形象和艺术结构充满了童话和寓言的象征意义。在“伟大的爱”中诞生了第一代鲸鱼孩子，他们是沿海族群的开始，是自然界本身诞生的楚科奇民族的开始。雷特海乌强调自然—动物—人类之间的联系在当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祖先，特别是对鲸鱼的尊重态度是楚科奇人存在的基础和核心，对自然的友善和对他人的尊重态度，人与周围自然的和谐是神话中的现实，它本身保留了一个强大的固定在纳乌和雷武意识中的伦理原则。

作家将不朽赋予了纳乌，她存在的本身就具有神话性。她能够跨越时间而存活几个世纪。她不断将人类起源于始祖鲸鱼的传说灌输到新一代的记忆中，使其相信每个人的身上都流淌着古老鲸鱼图腾的血液和精神。更重要的是她不断强调，自古以来，鲸鱼直接影响了砾石沙滩附近丰富的海洋动物，它帮助人们狩猎，为人们提供了充实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暗示，如果他们违反了始祖的禁令则会导致她的死亡。

《鲸群离去》的特点在于它对民间传说主题的有机运用，同时也在于非民间传说的新情节的大胆构建。在这样一个熟悉和不熟悉的组合中产生了强大的情感力量。在古亚细亚的民间传说中并不存在道德上禁止捕鲸的情节。因为捕鲸长期以来一直是北方人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件。作家创造性地改变了楚科奇人在民间传说中建立的对捕鲸的观念，创作了一个带有强烈人文主义色彩的情节。作品披着民族神话的外衣，但承载着一种新的思想和道德内容。20 世纪神话小说都存在着一种融合的世界观，反映了多神教与自然环境的不可分割性。神话以隐喻的方式将人类的生命周期、商业、经济以及自然历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神话代码的交织。这不仅仅是世界观特征，也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哲学，即认为人、动物、植物在本质上是等同的。

3 萨满文化

萨满教是北方少数民族主要信仰的宗教。萨满教渗透于社会与家庭的各个层面，构建了人、自然、社会与文化的一体化体系。楚科奇人相信万物有灵，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成捆的物品，以动物和鸟类的遗骸为主，其中必须有祖先的画像、燧石和家庭传统物品：

乌鸦的喙、熊掌、狐狸或者狼、北极熊、棕熊的皮。根据楚科奇人的说法，所有这些物体都拥有内在的生命力，它们虽不是神灵，但能够用熊或狼的力量、狐狸的灵巧和狡黠、乌鸦的智慧以及祖先的力量来保护住所里的人。

萨满教在社会中的活动和作用是一种历史现象，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共同形成和发展。楚科奇盛行家庭式萨满活动，该民族每三四个人中就有一人自称是萨满。萨满会定期或出于需要举行仪式，为家庭提供“精神营养”，并为某些社会再生产行为提供决策。在楚科奇每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成员会通过萨满的方式与神灵沟通，进行初步的交流，向神灵请求某种许可或为其献祭等等。

萨满文化是雷特海乌创作的重要源头之一。雷特海乌的祖父就是著名萨满，其名字“雷特海乌”即源自祖父主持的萨满仪式。小说《鲸群离去》的多个情节描写中融入了萨满教的文化元素。猎人出海狩猎时遭遇了风暴，原本以为马上要死去的猎人被鲸鱼群救起，人们跳起了庆祝的舞蹈——鲸鱼舞。就在这时“埃努一边唱，一边感觉到，在他的心中，新歌的歌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他本身并没有花力气，好像有一个人，有一个新人附在他的身上，通过他的嘴在歌唱，他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惊讶不已……”（雷特海乌 1997：84）音乐与舞蹈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是萨满执仪时不可或缺的元素。埃努出现的这一状态就是萨满执仪时灵魂附体的情形。

楚科奇萨满活动没有脱离家庭生产、经济和渔业活动。“实际上，在楚科奇、因纽特、科里亚克等许多北极民族中，萨满功能首先体现在对献祭、庆典仪式的组织和主持上。”（曲枫 2021：114）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或几个手鼓，家庭成员在手鼓上做敲击的动作，打手鼓唱圣歌。“萨满通过祈祷、鼓乐、歌唱邀请动物和祖先神灵在场，享受族群的颂赞，与人们分享饮食和娱乐，人类与自然平等的互惠关系得以展现。”（曲枫 2021：117）鲸鱼节是楚科奇族较大的节日，类似“感恩节”，人们要向海洋投放圣餐，夜晚则举行庆祝仪式。在跳舞时，吉乌产生了与埃努跳起鲸鱼舞时同样的状态，“每次按铃鼓的拍子跳舞时，吉乌总是有一种吃惊的感觉，他一直感到惊讶不已。他好像又开始长高，身体变粗，占据了棚屋的空间，然后，他从上面出气口飞出，四下蔓延，沿着整个砾石沙滩，向海峡，向潟湖外，向岩穴填满了变成黑冰的陈年积雪的悬崖延伸。他的心脏、肺也和他的身体一起变大，在棚屋里，空气已经不够他呼吸。”（雷特海乌 1997：119）这段描写再一次证明了雷特海乌的神话逻辑：鲸鱼的舞蹈使人变成了鲸鱼。人与鲸鱼跨越了界限，只有在仪式舞蹈中，吉乌才感觉到他与鲸鱼的亲缘关系。作家在这里遵循了“死亡和出生”的神话原型，只是小说中吉乌的新生是通过想成为父亲的强烈愿望来隐喻的。与神话不同的是，吉乌精神和肉体的重生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生的：“多少个激情之夜，吉乌一直盼望标志着生育、标志着新生命开始的最大幸福的到来，但是，无论他怎么尽力，都没有发生。”（雷特海乌 1997：120）在痛苦中他仍在寻求纳乌不朽的真理，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考验，克服这种考验需要主人公的“暂时死亡”：“半夜里，他被惊醒了，一身冷汗。他摸了摸，磨得锋利的刀刃在想象，刀刃如何刺进纳乌老太婆的筋、荡着许多皮的脖子，鲜血是如何染红了床上那白色的鹿皮……吉乌不知道如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怎样赶走这些可怕的思想。”（雷特海乌 1997：122）只有当他感受到他所孕育的新生命时，他才会获得重生。吉乌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就像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获得重生一般，充满了新的感觉，获得了存在的意义。

萨满的形象是楚科奇文学中重要的形象之一。20世纪30—80年代，在文学之外的因素（反对宗教、主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下，这一形象多具负面的内涵。萨满往往被描绘成欺骗和抢劫他人的角色，要求人们为他们的服务支付高额费用。雷特海乌作品中的萨满形象的转变很能说明问题。从早期作品《告别众神》（Прощание с богами）开始他就谴责萨满的活动。作家描绘了一个拥有驯鹿群和海象栖息地的萨满，不允许周围村庄的居民捕猎海象，萨满使他们陷入饥饿和贫困。后来雷特海乌创作中的萨满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化。《鲸群离去》

中的吉乌就是萨满的形象。“博戈拉兹遇到的大多数萨满宣称他们没有指导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超人类的指导者。”（伊利亚德 2018：254）吉乌遇到了隐形的指导者：“如今你将比任何人看得多，比任何人听得多，听得清楚。”（雷特海乌 1997：124）在指导者的引领下吉乌具备了一个萨满该具有的能力：眼睛能够看到雪被风吹成的每个褶皱，鼻子嗅到河冰以及埋在厚厚雪层地下疲惫冻土的气味。这与博戈拉兹记录下来的萨满受到指导者引领的情形如出一辙。吉乌受到隐形指导者的引领后，生活也随之发生变化：他能够得心应手地打到猎物，他给居民们出的主意总是能够非常管用。医治病人是萨满必不可少的主要职能之一。吉乌学会了用草做成草药以及用海洋动物的各种部位制成膏剂来医治病人。吉乌会用自己的方式与隐形人沟通，祈求获得指导者的帮助。“有时，当吉乌觉得自己有必要自己请隐形人说话时，他便拿了铃鼓，用水浇湿了咚咚作响的鼓面，吹灭了帘子旁的灯，一边唱着，一边不时地停下谛听。”（雷特海乌 1997：126）这是典型的萨满召唤神灵并与其沟通的仪式。吉乌逐渐成了村庄里能够“救命的人”。村子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疾病，死者一个个接二连三地死去并被送往故人山。作为村中的唯一“通灵者”，吉乌被赋予拯救族群的期望。吉乌发现了载有疾病的“小不点”们的雪橇，最终将他们送出村庄，战胜了疾病。在这里作家对吉乌的萨满形象并没有谴责，而是把他称为“医者”，是村庄守卫者和拯救者的形象。

雷特海乌的小说《遗忘之镜》（В зеркале забвения）和《最后一个萨满》（Последний шаман）中都有萨满——姆雷特金的形象。作家本人将小说《最后一个萨满》称之为家族史，讲述了自己家族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作家以祖父为原型，叙述了乌艾连著名的萨满姆雷特金的一生。作品中详细描写了作为萨满的姆雷特金执仪时的身心变化以及念诵的各种咒语。小说中萨满姆雷特金被描述为一个由博戈拉兹亲自教授俄语的人，他住在美国，出席民族学展览等，但研究者却并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这一事实的材料。很显然，作家将历史事件与自己的艺术构思结合在一起。提到在乌艾连的童年时光，作家经常回忆起祖父，但祖父却在1937年被枪杀。作家的祖父是沿海一带有名的萨满，曾作为楚科奇原住民代表，到过莫斯科与加里宁会面。然而，他却是第一批被宣布为“楚科奇人民公敌”并被枪毙的人之一，因为当时的苏维埃政府认为萨满的行为不仅仅是无知的表现，更是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削弱了楚科奇人对一切苏维埃和新事物的信心。

《最后一个萨满》所讲述的姆雷特金的悲惨故事，是作家对过去负面现象的批评。雷特海乌重新思考对萨满教的态度，当时这种宗教现象被视作是“野蛮人愚昧的本能”。作家则认为萨满教是北方民族特有的信仰体系，是人们生活经验的集中体现，积累了用草药和植物根茎治病的技能，萨满通过与“神灵”的沟通唤醒人体内能够创造奇迹的内在力量。对楚科奇作家来说，萨满的音乐、舞蹈、服饰等都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一个萨满的离去则预示着民族信仰与文化记忆的淡化，甚至是消亡。楚科奇的萨满文化体现的是楚科奇人自古以来的自然观与宇宙观：人们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承认人类与自然生命的平等，只有建立平等的关系人才能与自然万物共生。

4 楚科奇族节日与仪式

节日与仪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对于文字出现较晚的民族来说，“‘文化记忆’主要以非文本的形式得以流传，仪式成了一种形成集体记忆、表达自我认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转引自杨·阿斯曼 2015：129）鲸鱼节是楚科奇、爱斯基摩等北方民族的传统节日。鲸鱼在北方民族的童话、神话和传说中是沿海人类的始祖，是一种与人有着血缘关系的动物，与人有着一系列微妙的精神联系。人们对其持尊敬的态度，但生活在自然条件艰苦、气候恶劣的极地地区的人们又不得不猎杀海洋动物以获取生存所必需的一切。鲸鱼节具有“感恩”与“赎罪”双重意义，即庆祝狩猎成功，亦通过仪式将鲸鱼灵魂归还海洋。

《鲸群离去》中重点描写人们从筹备到庆祝鲸鱼节的完整过程。人们储存海象肉，从牧民那儿换来鹿皮。“给蒸汽上弯成的木环上蒙上精制加工过的海象肚，安上了用海象犬齿磨成的把手。宗教的木桨上画上了花饰，描绘着古代鲸鱼如何拯救男人的传说。人们编了许多新的歌舞，缝制了华丽的衣服，鹿皮上涂上了从遥远山脉的山脚下弄过来的血赭石。”（雷特海乌 1997：117）这一时期苏联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出现商业交易，服饰、工具、食物越来越多样化，从最初单调的海豹肉变成了红虾、海星、贝壳、海草等食物。作家意指社会在逐渐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庆祝节日的方式随之变化。

庆祝节日时人们唱着有关传奇人物雷武的歌。一个重要的仪式是向海洋中投放圣餐，“鲸鱼节的白天和晚上，都有仪式性的舞蹈和萨满活动。节日结束后，所有的残羹剩饭、碎屑、渣子和从皮肤上掉下来的皮毛都要收集起来扔进大海里，预示着被杀鲸鱼的生命得以恢复并使其回归大海。”（Богораз-Тан 1939：100）

不同民族对死亡都有着不同的态度，丧葬仪式更是形式多样，其中体现出来的是部族独特的生死观与自然观。小说第一部分的最后描写雷武死后举行的告别和安葬仪式：“他们给纳乌穿上了出殡的白衣服，头上紧紧地系上了皮帽，在门口燃起了篝火。他们把死者的尸体从纯净的火焰上抬过，放在雪橇上。儿子们套上雪橇，接着，雪橇被拉往海边，滑木在新鲜的雪地上吱吱作响。”（雷特海乌 1997：55）按照楚科奇的丧葬传统，一般用狗拉雪橇或是亲属拖着雪橇将尸体运送至安葬的地点。

“孩子们默默地拉着雪橇，他们尽力在乱七八糟的浮冰群中寻找平坦的路走，以便不要有什么东西惊动永远沉睡的人。为安葬打下的洞口，边上的海水没有结冰，一会儿上涨，一会儿下落，显露出大海激动的呼吸，似乎大海以及大海的深处——明白了发生的事。在冰窟窿里一片冰糊状，其中有一个儿子拿了一把用结实的鹿角做的，缠着髯海豹皮的长柄勺，在舀完了薄冰，把绿色的、深处几乎是发黑的水清理干净后，他站着，看了一眼弟兄们。他们默默地放开父亲的遗体，把他抬到冰上，脚朝着水。他们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推动遗体，接着，遗体很轻快地滑进水中。他们把雪橇也跟在遗体的后边投到了水里，它很快沉入了水底，好像它不是轻木做的，而是用沉重的海象骨加工而成。”（雷特海乌 1997：57）

这段描写中完整地记录了将逝者尸体送入大海中的过程。雷武是氏族的始祖，是由鲸鱼变成的人，本身源于大海，最终也要回归大海，所以后辈们将雷武的尸体送至大海里。

楚科奇的安葬方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用篝火焚烧尸体，另一种是将尸体运送至冻土带的指定地点。楚科奇的沿海居民和以猎鹿为生的牧民一般都会选择第二种安葬方式，安葬地点多为地势高的地方或山坡上。小说中将该地点称为“故人山”，克里亚乌和一些因不明疾病死去的人都被运送到了故人山：

“纳乌老太把拐棍的一端放在死者的头下，叽叽咕咕地和他交谈起来。她提了许多很长的问题后，等待死者回答。克里亚乌的回答是简短的，不过意味深长。他想带走一双结实的鹿皮靴和他猎取食物的标枪。纳乌小声地转告了死者的愿望，接着，在告别这一世界的人的脑袋旁堆放的东西越来越多，给他上天踏上云路时带走。男人们把克里亚乌抬往故人山。”（雷特海乌 1997：109）

在楚科奇流传着“三界”说，即上层世界、中层世界与下层世界。上层世界是神灵与自然死亡者的世界，中层世界是人类的世界，下层世界则是恶灵与死于疾病者的地狱，所以在文本中作者将人即将死去称之为“踏上云路”。按照楚科奇的丧葬习俗人们要在死者的脚下放两根长棍，认为，在死者的世界长棍就等同于死者的脚。有时会单独放或是放在死者的头下。人们会通过占卜的方式询问尸体想要以何种方式下葬、想葬在哪里、需要随身带走哪些

物品等问题。男性一般要带狩猎的工具，人们认为，在死者的世界里需要生前用过的东西，因此会将所有死者想带的东西作为随葬品。

节日与仪式是民族传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传统文化面临着消失的风险，而雷特海乌则扮演着文化传承者的角色，用文学这一特殊形式记录下了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节日与仪式，以此来唤醒和激发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

5 结束语

雷特海乌曾获苏联荣誉勋章、人民友谊勋章以及劳动红旗勋章，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极少数民族问题顾问。他的任务是帮助保护北极独特的原始文化与文明。雷特海乌是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最受欢迎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被誉为“楚科奇的福楼拜”和“北极的巴尔扎克”。他的《鲸群离去》创作于 1977 年，此时正是世界生态文学崛起的时期。在世界生态文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俄罗斯生态文学也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该时期的生态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是把保护自然与善与恶的问题结合起来，与道德题材挂钩。《鲸群离去》同样是一部具有道德劝谕性的作品。小说中再现了楚科奇民族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在展现沿海地区楚科奇民族生存环境变迁的同时，作家利用民族起源神话呼吁人们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雷特海乌认为，人只是自然的一分子，与世间万物地位平等，人只是世界发展中的重要参与者、传承者，而不是主宰者，在科技进步的同时要尊重传统，将本民族精神文化传承下去，并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 [1]Батъянова Е.П., Тураев В.А. Народы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а Сибири[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2.
- [2]Богораз-тан В.Г. Чукчи II. Религия.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Ю.П. Францоваю[M].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лавсевморпути, 1939.
- [3]Соколова З.П. Культ животных в религиях[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2.
- [4]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5]雷特海乌. 鲸群离去[M]. 陆永昌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
- [6]梅列金斯基. 神话的诗学[M]. 魏庆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7]曲 枫. 北极萨满文化的本体论特质[J]. 世界宗教文化，2021(4).
- [8]孙运来. 楚科奇人民族史志概述[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1).
- [9]米尔恰·伊利亚德. 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M]. 段满福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10]叶永胜. 论中国当代小说的“神话叙事”[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2).
- [11]周江波. 试析雷特海乌中篇小说《鲸群离去》的创作主题[J]. 今古文创，2020(36).

Chukchi Culture in the Works of Yu. Rytkeu — Taking *When the Whales Leave* as an example

Cheng Shuang-t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Yuri Sergeyevich Rytkheu is a well-known Chukchi (one of Russia's ethnic minorities) writer. All his works are based on the life of the Chukchi people, and have always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survival and spirituality of his ethnic group. In 1977 he wrote the novel *When the Whales Leave*, which revolves around the legend of the origin of the nation and embeds the epitom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into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topics of the origin myths, shaman culture, national festivals and rituals reveal the unique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e polar people.

Keywords: Yuri Rytkheu; Chukchi ethnic group; *When the Whales Leav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24 年度黑龙江省省属本科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 世纪俄罗斯北方少数民族文学民族认同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4-KYYWF-0016）。

作者简介: 程爽婷（1987—），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中俄学院教师，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4-12-11

[责任编辑: 刘 锐]